

毛洛合作与长征胜利

在 2006 年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的时候,我应约写了一部从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着笔的长征史:《毛洛合作与长征胜利》,得到读者和学界的肯定。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到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了。承蒙有出版家还记得,约我在原书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出一新版。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乐于为此。

长征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壮举。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干部党员,乐于听它的故事,了解它的历史,发扬它的精神,从中汲取力量,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而那些怀着别样心思和情感的人,则利用它来写相反的文章。他们著书立说,竭力声称,在红军长征途中,蒋介石并不想要消灭红军,他故意放走红军,让他们走到陕北。好像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围追堵截都是并不存在的事实。同样荒诞不经的是,说什么红军突破围追堵截的许多英勇战斗,如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等,也是共产党编造出来的神话,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鲁迅说得好:“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运用长征中的电报、文件、会议记录、历史遗存和当事人的回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事实,清楚地告诉人们历史的本来面目,说明那些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历史的著作之虚假和作伪。从这个意义上说,修订再版我的这本著作,告诉人们历史的真相,驳斥那些伪造和谎言,是值得做的一件好事。

长征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壮举。纷纭的事件,尖锐的斗争,复杂的人物,要分析精准,褒贬得当,评价确切,很不容易。有不同的以至对立的认识是正常的,是难以避免的。可以通过学术讨论,通过百家争鸣来求得统一。迄今为止,还有人忽视甚至无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对长征胜利的重要作用;更有甚者,有意无意间贬损张闻天,曲解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关系,给历史的真实笼罩上一层阴霾迷雾。因而,如杨尚昆所指出的,“看来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修订再版这本著作正是在长征这一历史阶段上给张闻天拨乱反正的机会。读者从本书可以看到,张闻天从长征前夕发表动员长征的战略社论,到撰写《瓦窑堡会议决议》论述长征伟大意义,直到指导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他不仅是长征的参加者,而且是长征的卓越的领导人。他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遵义会议胜利的配角而已。实际上,他和毛泽东一起,都是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当之无愧的主角,是领导长征胜利,改变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命运的当之无愧的主角。

乘新版修订的机会,本书增加了一些新发现的史料,对初版遗漏的个别问题作了补充,对全书作了润色,以期更加全面,生动,可读,耐读。对书中存在的差错和不足,欢迎读者和专家指正。尤其欢迎读者和专家就一些有不同看法的问题展开讨论……

《毛洛合作与长征胜利》新版后记



法国塞纳河畔 (油画) 姜天雨

今年是中国围棋天元赛三十届大庆。首先,我对新民晚报为中国围棋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深表感谢。中国天元赛培养和造就了很多围棋人才,得过中国“天元”称号的都是很了不起的棋手。新民晚报坚持不懈地举办中国天元赛三十年,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用现在流行的做法,我要为新民晚报点赞!

我与上海新民晚报的缘分,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日围棋擂台赛和中国天元赛开始的。当时,新民晚报十分重视围棋报道,特别是中日擂台赛的报道,很受读者、棋迷、棋手的欢迎。

1986 年年底,听到晚报要创办新闻棋战,我非常高兴。因



去年十月我从旧金山回来时,晨云陪我到 ICU 病房去看望宁老师。那个时候我呼唤宁老师,可能他已经听不到我的声音了。我虽然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有思想准备了,但是当听闻宁老师离开了我们,心里还是非常的沉痛。

这几天,心里面不断地在翻腾和宁老师在一起的每时每刻。1981 年,当我还在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宁老师向我们 77 届开了一门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那是我第一次聆听宁老师的讲课。本来我以为报刊史是一门非常枯燥的课程,但是当宁老师走进教室,走上讲台,他的讲课充满了激情,从此以后就把我带到了新闻史研究的领域。从那堂课以后,我就找宁老师说:“我大学毕业要写毕业论文,您能不能做我的指导老师?”宁老师满口答应。随后,就在那一年,宁老师开始招收第一届硕士生。当时我没有考虑一下就马上报了宁老师的硕士生。后来,武伟和我成了宁老师的第一届硕士生。跟着宁老师,苦学了三年,研究了三年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史。

当我硕士毕业那年,我国教育部第一次批准了人大新闻系和复旦新闻系两个新闻学博士点,批准了王中老师和甘惜分教授作为最早的博士生导师。那个时候我跟武伟,很想继续留在复旦学习,很想继续跟着宁老师、跟着王中先生继续做研究。所以我们两个人又继续报考了王中先生的博士生。当年,王中先生已经七十岁了。大家知道,王中先生一生非常坎坷,大家去查阅过去二十几年来的新闻学刊物,充满了对他的大批判的文章。所以,那年他虽然只比宁老师年长六岁,但是身体各方面已经年近体弱。所以新闻系当初就请了宁老师作为我们的副导师,这三年实

今年春天据说上海遭到了六十年一遇的寒潮,以至于小区里几棵足可盈怀的铁树都一夜“白头”,巨大的枝叶迅速地枯萎发黄,迄今生死未卜。而现在虽然已经是阳历三月,但其余威犹在,即使是走在明亮的阳光下,也会让人缩手缩脚的,好在路边的玉兰花已经开放,偶尔随风飘过的一丝香气,多少给人带来了一点春意。

不过,今年真正让我

故乡的红香椿

张 生

感觉春天来临的却不是那些白色的玉兰花,而是香椿。我是河南焦作人,记得小时候每到春天就会吃到新鲜的香椿。读初中时,我有个同学家在郊区,院子里种有好几棵香椿树,春天到来之时,我就骑自行车到他家,和他一起把镰刀绑在长长的竹竿上割树枝上刚发出的嫩叶,然后带一些回来吃。可能是香椿本身就

就很香的缘故,因此并不需要很复杂的烹调,热的炒鸡蛋即可,凉拌则切碎加盐,再滴一两滴小磨香油就可生吃。特别是后者,目之红绿相间,嗅之馨香恬淡,入口则清新芬芳,让人回味无穷。

可遗憾的是,我考大学去了武汉读书,印象中在那里四年没吃过一次香椿,紧接着我又到南京读研究生,当地的饭店里倒是有卖香椿炒蛋的,偶尔吃吃,但却感觉味道一般,似乎总没有家乡的香椿香。可当时,也就这么一想

际上是宁老师主要在带领我们。

我觉得我一生最幸运的就是有机会进入复旦大学,进入新闻系,更有机会跟着像宁老师、王中先生这样的导师,认认真真做学问,扎扎实实地做人。我觉得,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宁老师跟我讲述他的一生时提到,他真正开始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中扎扎实实研究中国新闻史,是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才开始。当时的宁老师已经过了六十岁了,用现在来看,那个时候已经是将近退休的年龄。我回顾一下,宁老师一生的主要学术成果,是六

忆恩师宁树藩先生

高冠钢

十岁以后从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初开始的这三十几年里,在新闻学研究领域里面辛勤地耕耘所得到的。宁老师曾对我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我们国家从一个错误的航道里走出来,我会一事无成。所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不只是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每一个学者,对每一个学科,都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其次我觉得宁老师对新闻学、新闻史的研究作出了那么重大的贡献,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宁老师一直非常注重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考证。他常常和我们讲,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那就是言必有据。每写一篇文章,每写一本书,每讲一句话,都要有出处,绝不能信口开河。

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在上海除了在新闻学系资料室有非常丰富的资料之外,徐家汇藏书楼是当时上海主要的一个收藏报纸和刊物的地方,我和武伟两个人常去那里。徐家汇藏书楼和复旦正好在市区的

就过去了。那时我还年轻,只有二十多岁,只想离家越远越好,并不觉得香椿不香有什么关

系,就是不吃也行。

但是前几天,我忽然在微信的朋友圈里看到一个焦作老乡晒了一下自己在上海买的香椿,我很是吃惊。我真有点孤陋寡闻,虽然我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但还很少看到哪里有卖香椿的,更不要说吃了。刹那间,仿佛有一股香椿的香味从我的手机里飘了出来。就像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里讲的,当他吃到泡在茶水里的小玛德兰点心时突然勾起了对往事的无尽的回忆,我在想象的香椿的香味里也才忽然意识到,从读大学到现在,不经意间我已经离开故乡都快三十年了。

我突然很想吃香椿,以前我好像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想过。第二天下午,我就到家附近的几个小菜场转了转,可一连问了好几个摊主都说没有香椿卖。我想实在不行,只好让那个老乡给我买点了。

东西两个角落,我还记得每次我们要坐 55 路公共汽车换 26 路再到那边查阅资料,单程就要一个多小时。那个时候,宁老师一有空就和我们一起去。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宁老师与我们一起去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照看宁老师,另一个人就上车去抢座位,能够让宁老师有个座位,能够让他一路上休息。宁老师就是这样在几十年间辛勤地发掘,对每一个资料认真地考证,其辛苦程度对没有搞过新闻史研究的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另外,从我和宁老师朝夕相处之中,我觉得宁老师学术上巨大的成就跟他的为人是密不可分的。我和宁老师师生情谊三十几年,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宁老师对生活有任何一点的抱怨,他的生活是最简单的生活,他只要日有三餐、夜有一宿就足够了。其他时间全部在研究

新闻学,全部在研究新闻史。同时他也非常淡泊名利,从来不为人事关系、为了名和利跟任何人去争。所以,他也从来不会被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所困惑,从来都是非常乐观开朗。只要有年轻人向他求教,哪怕是不认识的人送来书稿给他看,他就一定会认真地看,看完以后,他喜欢的,他会花几天时间去为人家作序,哪怕这个人是他从来没见过一面的。

最后我想说,宁老师非常幸运的是背后有一个全力支持他的温暖家庭。有这样的家庭对宁老师的全力以赴的支持,宁老师才能全身心地投入研究,潜心做学问,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记得去年年初我去看望宁老师,他还和我谈笑风生,还在我讲他的地方新闻史最后的出版的事情。宁老师在生命的最后三十几年里,作出了那么多的学术成果,写了那么多的书,培养了那么多的学生,我觉得宁老师真的是可以安息了!

一场春雨,公园的花坛边,草坪上,泛出点点葱绿,那是知春的小草,早早地接受了春的消息,舒展它们的娇弱的身躯……可是,让人触目是的,不少散落在花坛边和草坪上的园工们,坐在他们用泡沫塑料自做的坐垫上,正在认真地将刚刚出头的小草连根挖去,理由是它们不是公园人工种植的草皮和植物,它们被命名为“杂草”!为了草坪和花坛的干净和整齐,必须除去这些“杂草”!

这些“杂草”萌发的种子,也许是风将草籽吹过来的,也许是去年没有被除尽的某些种子留下生长的,但它们也应该有享受阳光、雨露和空气的权利呀!多么鲜活的生命,难道就因为生长在不是人们规定的地方,就该被以“杂”的名义无情地铲除?我心头难免有些悲凉和不平……

犹未尽,晚饭后我上网查了查有关故乡的香椿的信息,我这才发现,我们焦作的香椿竟然是天下名产,而且我区那位初中同学所在的郊区就是这种名为“焦作红香椿”的产地,难怪我在外地飘荡了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吃到过可以和故乡的香椿口味相媲美的香椿了。

而这或许就是故乡之所为故乡的持久的魅力,因为它总是有别的地方所没有的风物,这些风物又总是与我们的过往的生命相联系。南朝丘迟的名文《与陈伯之书》中有描写江南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佳句,据说就是这几句话让依附北魏的陈伯之因之动情而南归。可对我这个少小之时即从北方来到南方生活的人来说,现在看来,最让我动情的或许就是我们焦作的红香椿的香味了。

也许是多少还有些意办的一大原因吧。

我与新民晚报天元赛结缘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了,应该是参加天元赛围棋活动最多的棋手。三十年前,我就坚信在新民晚报引领举办天元赛之后,新闻棋战和各种棋战会层出不穷。三十年过去了,我的预言是大大实现了。现在我们不仅是国内围棋大赛层出不穷,就是我们举办的世界职业围棋大赛也超过了日本和韩国。

我由衷地希望新民晚报和吴江同里继续办好中国天元赛,让中华围棋发扬光大。

刘小光:天元赛伴随我成长……明请看本栏。



夜光杯